

在饱含才思横溢的语言中思接千载
在颇具历史韵律的行文中视通四方



线装书局

全球
全通

世界历史通览

全球
全通

第三册

刘凯◎主编

【图文珍藏版】



世界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球史
全通
世界历史通览

全球
通览

刘凯◎主编

第三册

綫裝書局



六、印度的宗教及文化

公元前 321 ~ 公元 1500 年

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阿育王死后，印度就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其中贵霜帝国和笈多王朝曾短暂统一过印度北部。各种宗教在这段时期也开始兴起，包括佛教和印度教；这个时期也是印度科学、艺术与文化的黄金时期。

公元 8 世纪，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印度，引进了伊斯兰文化。11 世纪开始，突厥人开始入侵印度北部，并建立了德里苏丹国，不过德里苏丹国的势力逐渐衰微，无力控制庞大的印度北部，印度逐渐又进入了分裂的时代。

恒河文化的兴起和东方的伟大帝国

对印度以后的历史进程来说，吠陀文化向恒河平原中部和东部的传布具有和他们在旁遮普和恒河 - 亚穆纳河间平原的早期拓殖一样的重要性。吠陀文化的东渐很快导致了首批历史王国的形成和第二个城市化时期的出现——第一个时期是印度河文明的都市化时期。

现在普遍认为吠陀时代人口的东迁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旁遮普和河间平原的肥沃地带变得越来越干燥，而与此同时，恒河流域的丛林已大大消退，从而变得可



以穿行了。古代文献表明，各部落不断地为争夺草场和农地而相互战斗。《梵书》经文中明白无误地记载着，只有两线作战的人才能成功地建立一块拓殖地，因为如果他只是单线作战，他已经夺取的土地就一定会被后来的移民所占据。这样，就持续存在着既反对土著人、也反对其他吠陀部落的战争。

东迁的另一种动机可能是逃避国王的统治以及在新的国王权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定居以保存他们的早期共和组织的愿望。《阿闍婆吠陀》中提到的乌拉提阿斯（Vratyas）之类的异端集团和联盟大概在这次迁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佛教经典中大量提到在公元前5世纪东方存在着强大的部落共和国，而起源于吠陀居住区西部的婆罗门教经典中提到的却大多是王国。

到目前为止，关于俱卢之野（Kurukshetra）以外这些迁移活动的时间和方向，我们还知道得不太多。早期的文献中提到过向南的迁徙：“人民胜利南迁。”阿槃提（Avanti）——其都城乌贾因位于俱卢之野以南约500英里的地方——是印度中部最早的前哨之一，在那里发现了公元前700年左右最初城市化的遗迹。不过，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也向北迁徙。一部婆罗门教经典写道：“只要一位父亲想重新安顿他的儿子，他就会把他安顿到北方。”可能的情况是，那些北迁的人并没有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停顿下来，而是沿着山麓继续东迁。印度历史学家们坚持认为这条路线可能是通向东方的最早通道之一，因为那里的丛林较少，而在平原地带横渡亚穆纳河和恒河的诸多支流时，溯流而上也比顺流而下容易。

向东方的渗透

东迁当然是最重要的迁徙活动。一本经文曾明确写道：“人民自西向东迁移，并征服了那里的土地。”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上述引文中的“土地”是用“kshetra”一词表示的，这个词是指适于耕作的土地。在《百道梵书》（Shatapatha Brahmana，意思就是“关于百条道路的梵书”）中也存在着一篇极富启发性的经文，这篇经文为弄清吠陀时代晚期文明向恒河东部平原的扩展提供了线索。这本经书中提

到一个名叫“韦德哥哈 - 玛塔瓦” (Videgha—Mathava) 的王子在位于帕特那东北的某个地方建立了毗提河 (Videha) 王国。据说, 这位王子是从火神阿格尼 - 瓦伊什瓦纳拉 (Agni—Vaishvanara) 领地内的萨拉斯瓦提河出发的, 而这位火神就是一位让我们久已闻名的大殖民者。韦德哥哈跟着他来到萨达尼拉 (Sadanira) 河 (这条河就是现在的甘达克 [Gandak] 河)。在这里, 阿格尼停了下来, 而未继续前进。经书中对这个故事有着娓娓动人的描述:

玛塔瓦·韦德哥哈, 彼时站立在萨拉斯瓦提 [河] 畔。他 [阿格尼] 于是去焚毁那里的丛林, 以开辟通向东方的道路……韦德哥哈 - 玛塔瓦跟随在他的后面, 他则在前面开道。他烧干了河里的水。现在, 那条名为萨达尼拉的河流从北方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 流淌而来: 那是一条他没有烧干的河流。想想看呀, 那是一条婆罗门以前从未跨过的河流, “它不曾被阿格尼 - 瓦伊什瓦纳拉烧干”。

然而, 现在, 它的东面却出现了许多婆罗门。在那个时候, 那里 [萨达尼拉河以东的土地] 还是未曾开垦的, 荆棘丛生, 因为那里还没有受到阿格尼 - 瓦伊什瓦纳拉的光顾。

然而, 现在, 那里已经得到了垦殖, 因为婆罗门已经通过献祭使得 [阿格尼] 光顾了那里。即使在季夏, 那条 [河流] ……依然流淌于……

玛塔瓦·韦德哥哈于是问 [阿格尼]: “我该居住在哪里呢?” “你可以居住在这条 [河] 的东边!” 他回答道。即使在现在, 这条 [河] 依然形成了拘萨罗人 (Koshalas) 和毗提诃人 (Videhas) 的界河。

这里描述的事件意义重大。对婆罗门来说, 萨达尼拉 (甘达克) 河以东的土地最初是不洁的, 因为他们的大神阿格尼还未跨过这条河流。在编纂上述经文的时代, 人们对此显然还记忆犹新。尽管如此, 毗提诃王子并未征服这个国家。经文中使用的 “etarhi” 这个词的意义是 “现在”, 它明显是用来指经文写作时的状况。因此, 到这部梵书经文写作的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 8 世纪), 这片土地已被认为可以为婆罗门接受了。不过, 因为婆罗门的神祇还没有踏进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被认为劣于西

方的土地。由于具有业已高度发达的土著红铜文化和社会的诸多因素，该国的这个地区甚至在公元前 1000 年代中期对正统的婆罗门来说依然是可疑的和纯洁的。因此，我们只能同意赫尔曼·奥登博格（Hermann Oldenberg）在他那部于 1881 年初版的论述佛教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当我们考察佛教的起源时，我们必须记住最早的佛教圣会系位于口吐火焰的阿格尼—瓦伊什瓦纳拉在东迁中尚未光临的乡野或这些乡野的边缘地带。”

与那些不能精确确定日期的零散的文献记载相比，考古研究更能揭示恒河文化建立的情况。自印度独立以来，印度考古调查委员会（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做了巨大努力来发掘印度北部的早期历史城市。一些遗址的年代尚待确定，但人们一致同意，自公元前 7 世纪晚期至公元前 5 世纪晚期这一时期是印度文化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完全可以说，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这个时期，最初的领土王国在恒河平原的中部地区建立起来，北印度经历了另一个城市化时期，而次大陆上现在归属巴基斯坦的那些地区则为波斯皇帝大流士大帝（Dareios the Great）所吞并。在这个时期的末尾，印度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乔达摩佛陀进入了历史的视野。

从无数个小部落王国（janapada）中，16 个大王国（mahajanapada）在公元前 5 世纪脱颖而出。这些邦国的形成是与农业的扩展、对贸易路线的控制以及一种新的更具侵略性的战争形态密切相关的。文献未必总会使用相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大王国，但是列出那些业已被考古研究证实了的最重要的王国还是可能的。它们是：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甘蒲耆（Kamboja）和犍陀罗（Gandhara）；位于西部河间平原的俱卢（Kuru）、苏罗萨（Surasena，首都是马图拉）和般庶（Panchala）；位于东部河间平原的跋差（Vasta，首都是俱赏弥 [Kausambi]）；迦尸（Kasi，首都是瓦腊纳西）及位于其北面的拘萨罗（Koshala）；帕特那南面的摩揭陀及其北面的末罗（Mallas）和跋耆（Vriji）部落共和国；临近现在比哈尔和孟加拉交界地带的鸯伽



(Anga)；印度中部则有阿槃提（首都是乌贾因 [Ujjain]）和其东面的车提亚 (Chetiya)。整个大王国体系的中心是恒河—亚穆纳河间平原及其东面的毗邻地。

这些大王国的起源和内部组织依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由于这些早期部落通常比较小，一个大王国的所有居民不可能都属于那个以其名字命名的部落。因此，它们必定是几个部落的联盟。其中的一些大王国拥有两个都城，似乎说明它们至少是由两个较小的单位融合而成的：哈斯提纳普拉 (Hastinapura) 和因陀罗普拉斯塔 (Indraprastha) 都位于俱卢族的土地上，而般庶则囊括了卡姆毗拉 (Kampilā) 和阿蓝车多罗 (Ahicchatra)。这些国家的结构可能类似于中世纪晚期的印度教王国：王权的直辖领地局限于部落周围地区，而隶属于该王国的各公国享有很大的内部自治。这些公国的首领只参加国王的战争和掠夺行动，他们也参加王室庆典。这些大王国的唯一确定的疆界是河流和其他天堑。国王权威的扩展依赖于边境部落的忠诚，而这些部落也会受到其他邻近王国的影响。

恒河流域的城市化

这些大王国的兴起是与公元前 600 年后恒河平原上早期城市中心的形成直接相关的。恒河平原中部的六个大城市中的五个是大王国的都城：王舍城 (Rājagriha, 摩揭陀)，瓦腊纳西 (迦尸)，俱赏弥 (跋差)，舍卫城 (Sravastī, 拘萨罗) 以及占婆 (Champa, 鸯伽)。只有第六座城市萨克塔 (Saketa) 不是一个独立的都城，而是坐落在拘萨罗境内。它一定是某个与拘萨罗同时出现的早期部落王国的中心。印度中部有乌贾因 (阿槃提)，西北部有塔克希拉 (Taxila, 犍陀罗)，或者更确定地说，是最近发现的那个早期城镇，它出现的时间比塔克希拉和附近那个位于比尔堆 (Bhir Mound) 上的城镇更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波斯占领时期。在公元前 5 世纪和 6 世纪，政治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看来存在着某种关联。

恒河平原上的这些新城市 and 哈斯提纳普拉之类的早期城镇之间的最明显的不同

表现在筑垒体系的有无上。早期的城镇是不筑垒的，而这些新城市都修有城壕和城墙。城墙是用土夯成的，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起也开始部分地使用砖块，后来它们就由坚固的砖墙取代了。印度河文明衰落1000年后，人们再次发现了在砖窑中烧制的砖块。俱赏弥的防御工事最引人注目，它的城墙大约有4英里长，某些地方的高度达到了30英尺。曾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俱赏弥的考古学家G. R. 沙儿马（G. R. Sharma）认为，这些城墙与印度河城市的城墙很像。在这些早期的印度河城市中也修建了聚会厅之类的公共建筑，而在佛教兴起后，这些城市里还修建了寺院和佛塔。与街道系统相关的城市规划似乎只是到公元前4世纪才重新出现。

城市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这些恒河流域城市中发现的穿孔的硬币。标准化砵码的存在则表明公元前5世纪已经出现了某种高度发达的贸易。从印度河文明时代到这个新的恒河文明，中间或许存在着某些文化的连续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无法回答。不过，有趣的是，在塔克希拉发现的1150枚银币中95%在重量上十分接近于印度河文明中标准化的石制砵码。

在恒河文明的这个时期存在着对一种称为“北方黑精陶”的新型陶器的大量需求。生产这种陶器的中心位于恒河平原。正像更早以前的“绘图灰陶”被确定属于旁遮普和河间平原上的晚期吠陀定居时期一样，这种新型陶器也表明了恒河文明及其影响经由许多贸易路线在印度其他地区的扩展。“北方黑精陶”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首次出现的，在所有上述大王国境内都可以找到，甚至出现于遥远的羯陵迦。1981年，在奥里萨发现了一座城市，并且部分地进行了发掘。这座城市约长1英里，宽500码，为坚固的砖墙所环绕。在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北方黑精陶”。

在这些恒河流域城市中尚未发现发展良好的城市文化通常会拥有的另一种重要标志——文字。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铭文依然是印度最早的文字材料。不过，由于婆罗谜（Brahmi）和佉卢（Karoshthi）这两种文字已经发展得完全成熟，学者们相信它们可能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在印度，文字的最初发展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波斯人的影响。在那时，波斯人控制着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而自右向左书写的佉卢

体系正是以波斯帝国的官方文字——阿拉姆文字为基础的。

佛教的兴起

这个新的恒河文明在一场针对吠陀时代晚期的婆罗门 - 刹帝利联盟的改革运动中找到了它的精神表达。这场改革运动主要是由乔达摩佛陀的教导构成的。乔达摩佛陀被认为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关于他的死期（parinirvana，即“圆寂”）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佛教界在公元 1956 年为他涅槃（公元前 544 年）2500 周年举行了庆典，现代历史学家和印度学家一般认为他约卒于公元前 483 年。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德国印度学家 H. 柏车特（H. Bechert）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这些根据后世佛教编年史和经文推测出来的日期都不能认为是毫无疑义的，佛陀生活和布道的年代可能要比目前公认的日期大约晚一个世纪。这些发现在 1988 年举行的哥廷根国际研讨会上得到了普遍赞赏，尽管没有得到一致接受，特别是没有得到印度历史学家的接受。由于早期佛教文献特别是佛本生故事表明在佛陀生活的时代北印度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城市社会，考古学证据看来也表明佛陀系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而非公元前 6 世纪，因为在公元前 6 世纪恒河流域的城市化尚处在起始阶段。然而，佛陀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大改革家。此外，还有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Mahavira）。他被认为是一位比佛陀年轻的同代人。耆那教，这另一种伟大的清教，注定要在印度形成一种不间断的传统，特别是在印度西部的富裕商人阶层中。后来，佛教传布到了其他许多国家，但是在印度本国却衰落了。可以说，大雄的教导重现于圣雄甘地的节俭伦理中。由于生长在古吉拉特的一个巴尼亚——巴尼亚是古吉拉特地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商人种姓——家庭，甘地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

公元前 5 世纪的这两种清教运动都是以吠陀的巫术思想和奥义书的神秘主义玄思向一种新型理性的转变为标志的。这种理性也出现在伟大的印度语言学家帕尼尼（Panini）的著名语法著作中。后来，佛陀的教导再次与神秘主义玄思、甚至密宗佛



教中的巫术思想糅合在一起，但他最初对理性的启蒙经验的追求清楚地反映在对解脱人类苦难重负的四谛和“八正道”所做的解释上。在获得对人类痛苦根源及解救之道的洞见之前，他已经有过苦修的实践，也经验过玄思冥想的无益。以清除生的欲望从而摆脱轮回为依归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看起来只是一个关于实践教导的问题，而非玄思冥想的结果。

数量浩瀚的佛教经卷详细地描述了乔达摩佛陀的生平和年代。他出生在现在尼泊尔的某个地方，是释迦族的一位王子。他在 29 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许多年里四处游荡，实行苦修，直到他在菩提迦耶（Bodhi Gya）悟道成佛。然后，他在瓦腊纳西附近的鹿野苑（Sarnath）首次说法，之后游历了现在比哈尔和北方邦东部的许多地方，宣扬他的教义，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众。他会见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君主——其中就有摩揭陀国国王频毗娑罗。

在他死后，500 僧侣为了编纂他的教示全集，在王舍城召开结集大会，以便他的真正教导能够保存下来。在吠舍离（Vaishali）召开的另一次结集大会却成了一次分裂的见证：“上座部”（theravadins）坚持僧众的清教理想，而一种新的运动却要求更加包容俗家信徒，扩大佛教僧团（sangha）的概念，以吸收僧侣以外的信众参加。与这个目标相一致，这个新的教派被称为“大众部”（Mahasanghika）。这就是“大乘佛教”（mahayana）的起源。“大乘佛教”是新教派对自己的称呼，他们很鄙视正统僧侣的“小乘佛教”（hinayana）。无疑，这种分裂对后来佛教和印度教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它也预定了佛教在印度本国的衰落。

波斯治下的西部地区

公元前 6 世纪，阿黑门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王国在几十年内崛起，成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主要帝国。凯洛斯（Kyros），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曾派遣一支远征军远赴阿富汗，并且到达了印度边境，但征服西北印度的重担却留给了



大流士（公元前521—485年）。在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约公元前518年）中，他提到犍陀罗是他的帝国的一个行省。仅仅在数年之后，别的铭文就把欣都什（信德）添加到了这个行省名单中。印度河就这样成了波斯帝国的边界。在此以前，一个在波斯军中服役的叫斯盖拉克斯（Skylax）的希腊人就已经勘察过这条河流。

我们对位于印度河沿岸的这些波斯行省的行政知之不多，但希罗多德说这些地区（Indoi）为波斯帝国提供了数量最为可观的税收。这看来表明，在大流士和薛西斯治下，这些地区是完全归波斯政府管辖的。有关这种完全新奇的行政系统的信息肯定传到了摩揭陀国，它的统治者正准备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第一个大帝国。不过，要确定波斯帝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历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考古证据依然欠缺，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金币迄今也尚未在印度出土过。只有塔克希拉的比尔堆和其西边的查尔萨达（Charsada）镇被认为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遗迹，但发掘那些遗址的考古学家并未在那里找到典型的波斯标记。

早期国家的起源

在大流士和佛陀时代，恒河东部平原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时期。这个地区的某些大王国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起对其他王国的霸权。一种战略四边形形成了：拘萨罗和部落联盟瓦吉（Vrijis）控制着恒河北部；跋差建都俱赏弥，统治着恒河和亚穆纳河交汇的地区；而摩揭陀则统治着恒河东南方的大片土地。

拘萨罗和摩揭陀实行一种极具侵略性的政策，它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取得对邻国的胜利，而且还要吞并它们的领土。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看来已经开始了这种斗争。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他为摩揭陀崛起成为印度最大的强国奠定了基础。朝向这个目标的重要一步就是对邻国鸯伽的征服。这样，摩揭陀国就能大大提高对东部平原贸易路线的控制，或许还能实现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频毗娑罗在新王舍城建立了一座更加宏伟的都城，以庆祝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说，他还在那里接见了佛陀，并接受了佛陀的劝化。频毗娑罗未得善终，他的儿子阿阇世（Ajatashatru）囚

禁了他，并将他饿死。

阿阇世继续他父亲的侵略政策，但迅速败于他的舅父拘萨罗国王之手。但这位国王也很快被他自己的儿子维鲁达喀（Virudhaka）除掉。然后，拘萨罗和摩揭陀起兵攻打北边的各部落共和国。拘萨罗消灭了佛陀所属的释迦（Sakhya）部落。从那时起，拘萨罗控制了从瓦腊纳西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广大地区。

摩揭陀对强大的瓦吉部落联盟的战争可能持续了 14 年，据说佛陀曾亲自劝说阿阇世不要发动这场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摩揭陀首次使用了装甲的重型战车和用来发射巨石的抛石机以杀伤敌人。为了更有效地作战，摩揭陀的两位将军在恒河岸边一个叫波吒厘子（Pataligrama）的村庄修筑堡垒。这座城堡迅速以它的新名字华氏城（Pataliputra，帕特那）而声名显赫。吠舍离，瓦吉联盟中的最强大的部落梨车（Licchavis）的都城，在佛教文献中受到高度赞誉。它的壮美的多层豪宅曾被特别提及。这座城市据说是由它的 7707 个家庭的家长会议治理的。这些家庭的人都骄傲地自称为拉贾（rajas，即王族）。当阿阇世眼看要建立起对恒河平原的霸权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西印度的乌贾因（阿槃提）国王普拉迪奥因（Pradyota）的挑战，后者甚至一度征服和占据过俱赏弥。不过，摩揭陀已经过于强大，以至于这种挑战已经对它奈何不得。

摩揭陀在两代人的时间内闪电般崛起，令所有力图解释古代印度第一个帝国起源的历史学家大惑不解。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突然出现了一个成功的王朝——印度历史充满了这样成功的故事，而是在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幅员广袤的国家竟然刹那间出现在恒河文明的边缘地区。相信帝国系从西亚某个中心扩散而来的理论的历史学家指出了如下事实：摩揭陀国的兴起恰恰是与波斯对西北印度的征服同时发生的。在印度河边波斯行省实行的新式帝国行政的知识也肯定已经传播到了印度东部。但是，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足以解释摩揭陀国的实际崛起。我们必须认真回顾一下公元前 7 世纪和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历史，以便发现这种新型国家形成的线索。

印度早期国家的形成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在恒河地区，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从吠陀迁徙时代的半游牧的小部落（jana）向大量具有明确地域的部落邦国（janapada）的转变。在第二阶段的竞争时代，16个大王国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脱颖而出。当其中的一个大王国（在这里，就是摩揭陀）吞并了周围的几个邦国并对其余邦国建立起霸权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或帝国阶段。这种三阶段的发展可以视作一种内部演进过程，特别是由于前两个阶段确实未受到外部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恒河文明中发生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和政治变迁，而正是这种变迁促进了帝国在第三阶段的出现。

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公元前7世纪铁器的引进使得人们能够在恒河平原东部地区清除丛林和开垦沃土，从而导致了强大的大王国的兴起，并最终造成了东部大帝国的形成。不过，迄今为止，并没有什么考古证据能清楚无误地证实这种把经济变迁作为摩揭陀国兴起的主要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古代文献提供的佐证也是屈指可数。然而确实可以肯定，铁在这个时期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虽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角色。看来即便在这个时期，铁还是主要用于制造武器。由于拥有卓塔—那格浦尔高原的铁矿储藏和更精良的装备，摩揭陀国可能占有某种战略优势。这样，大概并非偶然的是，摩揭陀国的第一次大战役就是针对邻国鸯伽的，因为鸯伽同样临近这些铁矿产地，或许还控制了铁器输往北印度的贸易路线。由此，摩揭陀在创建帝国之初就清除掉了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至今，阿闍世的后继者时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描述。佛教文献中提到他之后的四位统治者都是弑亲者，正像他本人和他同时代的拘萨罗国王维鲁达喀也被指控犯有这种罪行一样。这些记载可能并不完全可靠，但似乎也表明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无所顾忌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这种类型的君王在当时的一本论述治国之道的名作——考提利亚的《政事论》——中得到了简洁的描绘。在摩揭陀国的统治者中，什殊纳伽（Shishunaga）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不仅打败了阿槃提的普拉犹闍（Prayota）王朝（该王朝很久以来就是摩揭陀的一个重大威胁），而且还吞并了



阿槃提和俱赏弥的领土。在什殊纳伽的儿子卡喀瓦拿（Kakavarna）统治期间，第二次佛教结集大会召开。这在前面已经述及。卡喀瓦拿被刺杀，而这次据说甚至连一位王后都参与了谋杀国王的行动。

在这次密谋中成为摩揭陀新统治者的篡位者是马哈帕德玛（Mahapadma），他建立了短命却很重要的难达王朝。马哈帕德玛是一位首陀罗妇女的儿子，后来《往世书》中把他描绘成刹帝利的毁灭者——这显然既指他出身卑微，又指他战胜北印诸王。马哈帕德玛继续大力推行他的前任国王们的侵略政策。他征服了北印大部分地区、中印部分地区，甚至也征服了东部沿海的羯陵迦。在孔雀帝国以前，他被认为是印度最伟大的统治者；而在往世书记载的国王世系中，他是第一个拥有帝国头衔“Ekachattrā”的人，意思是“将全国统一在一把黄罗伞下的雄主”。黄罗伞是君权的象征。

希腊和罗马作家告诉我们，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西北印度时，难达王朝建都华氏城，拥有一支由20万步兵、2万骑兵、2000驷马战车和3000象兵组成的强大常备军。这是第一次提到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大象。直到中世纪时期中亚征服者引进大规模部署炮兵的新战法为止，这种战象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是印度统治者的最强大的战略武器。

难达王朝只有通过严厉征收帝国赋税和掠夺邻国，才能维持他们的庞大军队。他们的名字在以后的印度文学中变成了贪婪的代名词。关于他们将他们的巨大宝库埋藏在恒河下面的传说，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尼白龙根匿宝于莱茵河底的古老德国故事。马哈帕德玛的后继者是他的八个儿子，但他们每人只统治了很短一段时间，直到最后一位被旃陀罗笈多·毛利亚推翻。

尽管他们的统治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难达王朝必须被认为替他们的更加声名显赫的继承者——孔雀王朝铺平了道路。他们将北印度的很大一片地区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军队和政府被孔雀王朝接管，继续加以经营。不过，难达王朝缺少某些只是在孔雀王朝治下才出现的特质。正像从西方传来的某些新理念帮助

了公元前5世纪频毗娑罗治下的摩揭陀国的兴起那样，另一波西方影响的浪潮可能影响了难达帝国向孔雀帝国的转变。

亚历山大印度之战的影响

就欧洲的历史记述而言，亚历山大的印度之战当然是古代印度史上最闻名的事件之一。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个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印度的文献却对亚历山大之战三缄其口。对印度人来说，他不过是染指过印度西北地区的诸多无名征服者中的一个。只是在很多年以后，由于伊斯兰征服者将他视为一个值得效法的伟大统治者，印度人才记起亚历山大大帝。德里的一位苏丹自称亚历山大第二，而这个名字的伊斯兰版本（希坎德尔 [Sikander]）在以后的印度和东南亚的伊斯兰统治者中十分流行。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7年5月穿过阿富汗东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他与那里的部落争战了一年有余，直至他得以在公元前326年2月跨过印度河。塔克沙希拉（Takshashila，即塔克希拉）国王未经一役就接受了亚历山大的宗主权。他对希腊人慷慨好施，据说曾宰杀了3000头牛和1万多只羊来款待他们。然后，他向他们提供了5000人的辅助部队，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他的邻国国王波罗斯（Poros）作战。波罗斯国王属于起源于《梨俱吠陀》中经常提到的普鲁（Puru）部落的保拉瓦（Pauravas）部落。他率领一支拥有2000头战象的大军与亚历山大接战，但是亚历山大通过夜间突袭打败了他。尽管当时河水猛涨，亚历山大还是跨过了海达斯毗斯（Hydaspes）河。接下去，他让已被征服的波罗斯国王复位，使他变成他的盟友。

此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滂沱大雨毁坏了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他决心继续前进，但是当他的部队抵达海伐西斯河（Hyphasis，比亚斯河）——也就是现在拉合尔市的东边时，他的士兵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而这种情况在持续了八年的不间断征服中还是第一次发生。亚历山大确信他行将抵达世界的尽头，而他的士兵们对此

越来越不相信，因为随着他们的不断东进，他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国王和战象对他们严阵以待。亚历山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援引他们对波斯人的胜利以劝说他的部下继续前进。这篇演说成为亚历山大时代最动人的文献之一。但是，他的将军、代表士兵发言的寇厄努斯（Coenus）的演讲同样动人心弦。最后，亚历山大终于调转马头，带着他的部队沿印度河南下。在途中，他们与那个地区的部落——特别是马洛伊（Malloi，马拉瓦 [Malavas]）部落——发生了战斗。亚历山大差点死于其中的一次遭遇战中。于是，他折而向西，并和他的部分部队一同穿过了格德罗西亚沙漠。这个沙漠是现在俾路支斯坦的一部分。在这次苦难行军中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公元前324年5月，即他进入印度三年后，亚历山大返回了位于波斯的苏萨。次年，他死于巴比伦。

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和他的帝国在继任者（Diadochi）之间的瓜分最终使至少将印度一部分并入希腊帝国的计划寿终正寝了。到公元前317年，希腊在印度边境的据点被放弃了。这样，亚历山大之战在印度历史上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这次入侵的间接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亚历山大的随从和驻孔雀宫廷的首位希腊大使的记述是西方人了解印度自古代至中世纪时期的历史的主要资料。还有，后来在印度西北边陲（现在的阿富汗）兴起的希腊化国家，不仅对印度科学（如天文学），而且对印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雀帝国的建立

亚历山大之战可能对印度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间接影响。我们对旃陀罗笈多·毛利亚的先辈们知之不多，不过据说他的军事生涯是从清除亚历山大遗留在印度河边的前沿据点开始的。他如何成功地从那里扩展到了摩揭陀国，又是如何从最后一位难达皇帝手中夺得权力，至今依然模糊不清。印度文献，特别是著名戏剧“罗刹婆与指环印”（Mudrarakshasa），将旃陀罗笈多的崛起归功于他的政治谋士、一位狡猾的婆罗门考提利亚。他是《政事论》一书的作者。

无论如何，旃陀罗笈多看来在公元前 320 年篡夺了摩揭陀国的王位。此后，他用几年的时间来巩固他对帝国军队和政府的控制。没有文献表明他在这个时期发动过什么军事战役。但是，在公元前 305 年，塞琉古·尼卡托（Seleukos Nikator）在成为亚历山大东部疆域的统治者后，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意欲夺取亚历山大在印度的遗产。旃陀罗笈多率领一支大军拒之于旁遮普，阻止他的东进。在随后的和约中，塞琉古把喀布尔以东的全部土地连同俾路支斯坦都让予了旃陀罗笈多。这样，孔雀帝国的疆界差不多就和两千多年后莫卧儿帝国全盛时的疆界一样。旃陀罗笈多赠送的 500 头战象与这巨大的领土收益相比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不过，印度的这项军事援助据说在差不多四年后塞琉古击败他的西面邻国和劲敌——安提格罗斯（Antigonos）的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欧洲人对印度的认识通过塞琉古的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在旃陀罗笈多宫廷期间的记述而得到了很大提高。麦加斯梯尼的原作已经遗失，但几位经典作家从他的著作中引述了大段文字，从而使我们能够知道他在旃陀罗笈多宫廷中的所见所闻。他的两类记述特别引人注目：他对孔雀帝国都城华氏城的描绘和他对在那里发现的七个印度社会阶层的描述。

他说华氏城是用木栅来护卫的。这座城堡状似平行四边形，长约 9 英里，宽约 1.5 英里，有 570 座塔楼和 64 座城门。华氏城的周长约为 21 英里，因而这座城市大约是马可·奥里利乌斯皇帝时期罗马城的两倍。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华氏城肯定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麦加斯梯尼好像夸大了他作为大使所在的这座都城，以提升他的身价。不过，德国印度学家 D. 史林格罗夫（D. Schlingloff）业已表明，根据麦加斯梯尼的描述推算出来的塔楼之间或塔楼与下一个城门之间的距离与考提利亚在《政事论》一书中描绘的这类防卫设施之间的距离相当一致（即 54 码）。

麦加斯梯尼对摩揭陀社会的描述似乎同样准确。他提到哲学家是第一等级。显然，他所说的哲学家就是婆罗门。第二等级是农夫。根据麦加斯梯尼的说法，他们